

徽州普通家族的谱系构建

——歙县刻工家族虬川黄氏族谱编纂考

张舰戈

摘要: 编修族谱是明清时期徽州各宗族的一项重要活动,即使是一个普通家族,也有强烈的编修族谱的愿望。歙县虬川黄氏以刻书技艺精湛闻名于世,族中没有出现过富商大贾和显赫官员,成员大多生活并不富裕,是徽州地位比较低微的平民家族。该族十分重视家谱的纂修,历经几代人的努力,于清道光年间纂成《虬川黄氏宗谱》。与其他许多宗族相似,虬川黄氏修谱也存在虚构世系和攀附贵胄等现象。《虬川黄氏宗谱》通过对宗族远代世系和祖先小传的构建,将本族列为望族之后,希望以此抬高自身的社会地位。虽然普通家族所修族谱比较简单,却真实地展现了中下层家族宗谱的编修状况。

关键词: 徽州; 宗族; 族谱; 刻书业

中图分类号: K29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019(2020)04-0001-08

基金项目: 第63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8M631682)

作者简介: 张舰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北京 100101)。

明清时期是修纂族谱最为活跃的时期,此五百余年间徽州各家族编修、刊刻了数量巨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族谱。修撰族谱并非易事,往往需要举合族之力才可完成。虽然修谱耗费巨大,但在徽州这样一个宗族观念极强的地方社会中,族谱被认为是尊宗敬祖、维系家族团结的最重要方式之一,所谓“自有姓氏而后即不可以无谱,谱之作,所以明本始,敦孝弟,重彝伦,统族属也”^①。修谱的观念普遍存在于各家族的宗族意识之中,形成了“新安多望族,族各有谱”的情形。所以,在徽州即便是一个经济条件并不富裕、“代鲜殊荣”的普通家族也有强烈的编修族谱的意愿。他们所修的族谱或许不像望族族谱一般“华丽”,在编修过程中无法邀请社会名流作序跋、传记,也存在一些攀附、捏造的成分,或许还有资金不足、草草了事的遗憾,但也正是这些普通家族对修谱的重视和执着,使我们得以窥见社会底层家族的基本状况,为我们了解家族的修谱过程、族谱特点和宗族生活提供了丰富、详细的资料。普通家族所修族谱与那些名门望族的族谱一样,也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价值。明清时期,以辈出刻工巧匠而为人熟知的歙县虬川黄氏家族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一、虬川黄氏刻工家族及《虬川黄氏宗谱》

明清时期,徽州刻工在雕版印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虬川黄氏家族是其中最为著名的刻工家族之一,从天顺至道光年间,在刻书业发达的地区都留下了黄氏刻工的身影。他们技艺精湛,行走于全国各地,在明清刻书,尤其是徽州刻书中时常可见他们的身影。程敏政曾称“吾乡锓梓刻石必归之歙仇村黄氏。”^②虬村黄氏曾为许多知名学者、官员刻书,并得到他们的青睐和赞赏。程敏政多次请黄文

^① 黄开族《重修家谱后跋》,《虬川黄氏宗谱》,道光十年(1830)刊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②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36《书赵松雪千文帖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632页。按“仇村”是“虬村”的另一种称呼,两者为同一地方的不同名称。弘治《徽州府志》载“集庆堂,在仇村,黄积善建”(弘治《徽州府志》卷10《宫室》,《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此黄积善正是虬村黄氏第二十一世祖。

敬(虬川黄氏第二十二世)为自己摹刻诗集、碑文,并亲自为其作《题黄文敬杏林卷》诗一首,对黄文敬身怀摹刻绝技,却未能得伯乐赏识而感到惋惜^①。黄氏刻工也出现在许多著名的官刻、家刻和坊刻作品之中,如徽商巨贾汪云鹏的环翠堂所出徽派版画精品《坐隐先生精订棋谱》,万历间泊如斋的《宣和博古图》,明末清初陈洪绶绘《博古叶子》等皆为黄氏所刻。另外,南京国子监、紫阳书院等官刻场所亦有黄氏身影。

据《新安名族志》和《虬川黄氏宗谱》记载,虬村黄氏为汉代孝子江夏魏郡太守黄香之后。黄香传九世为黄积,任晋新安守,卒于任。积子寻因“庐于父墓,遂家新安”^②。二十一世黄璋从黄墩迁于歙西黄潭,二十四世黄芮有两子:文瓚居潭渡,文炳迁至虬村。黄文炳成为虬川黄氏一世始迁祖,但后来文炳又迁回潭渡,直到文炳第十三世孙黄三才于淳熙间“复徙居虬村,其后子孙派衍支蕃”^③,遂成虬川黄氏。

黄氏家族中只有二十五世黄铨曾在兵部为书吏,其子黄国华(原名应华)于万历朝鲜之役时为“蓟辽总制标千总”^④。除此二人外,黄氏几乎无人从政为官,修谱人黄开簇也认为自己的家族“少殊荣显爵”,是一个“食德服畴,安居乐业”之家^⑤。黄氏刻书技艺世代相袭,他们或由农民转为刻书工匠,或是子承父业成为刻书艺人,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手工业者。黄氏家族很少有人通过刻书发家致富,家族成员大多生活并不富裕,在黄氏宗谱的传记中很多传主都是“家贫如洗”,“四壁萧然,家无担石”。如嘉万间刻过《徽州府志》《筹海图编》等书的黄铨,生前曾与汪道昆等名士同游黄山,死后却也未留下多少家产,其寡妻洪氏“甘贫守节”,在岁荒年份只能“竭力纺绩以孝事姑”^⑥。又如黄德新、黄一维、黄利中祖孙三代皆为技艺精湛的刻工,家庭生活也十分拮据,子女“延师就塾”、“嫁女婚男”很大程度上皆靠黄一维妻子汪氏做针线纺绩维持^⑦,到第三代黄利中之时,更是“家益贫”^⑧。连主持编修族谱的黄开簇本人也是“家无中人之产”^⑨。可见刻书并没有给黄氏家族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虬川黄氏家族确是“富家无几”^⑩。

即便如此,虬川黄氏仍然十分重视家谱的纂修。据族谱称,虬川黄氏在元末明初就有修谱之举^⑪。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万历二十四年(1596),又有二十三世黄永早、二十六世黄应济先后修谱^⑫。这两部族谱比较简略(嘉靖谱仅两卷),可能也没有刻印行世,这与财力不济有很大关系,黄应济就说“恨无绵力不能以付诸梓”。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二十九世黄师浩在藏有旧谱的“集庆堂”内发现残存的明代“未能成帙付梓”的旧谱,梳理出虬川黄氏家族源流及修谱历史,以待“异日之贤者修辑宗谱之时,为一助观云耳”^⑬。虬川黄氏再次修谱已到道光年间,三十一世黄国印开始编修,经其子黄鼎瑞,至其孙黄开簇,三代人接续努力,最终于道光十年(1830)在三十三世黄开簇的主持下编成付梓。此时距上一次万历修谱已有二百三十余年。

《虬川黄氏宗谱》对了解黄氏刻工家族的基本情况,如家族世系、分支、成员生平等问题提供了珍贵的一手材料,现在主要保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安徽省博物馆。目前学术界对《虬川黄氏宗谱》的研究多侧重于用族谱梳理黄氏刻工的世系、生平、关系,如周芑的《〈黄氏宗谱〉与黄姓刻工考证》、翟屯建的《虬村黄氏刻工考述》、刘尚恒的《〈虬川黄氏宗谱〉与虬村黄姓刻工》、曹之的《明代新安黄氏刻书考

①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36《书赵松雪千文帖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2册,第632页。

② 戴廷明、程尚宽等《新安名族志》,朱万曙等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158页。

③ 黄师浩《虬川黄氏家谱源流序》,《虬川黄氏宗谱》。

④ 《虬川黄氏宗谱·明蓟辽总制标千总西亭黄公行略》。

⑤ 黄开簇《重修家谱后跋》,《虬川黄氏宗谱》。

⑥ 李端明《节孝贤妇洪氏孺人传》,《虬川黄氏宗谱》。

⑦ 曹学诗《节孝黄母汪太夫人传》,《虬川黄氏宗谱》。

⑧ 曹学诗《黄君义先老人传》,《虬川黄氏宗谱》。

⑨ 江忠倚《赠耕野世讲序(附刊后)》,《虬川黄氏宗谱》。

⑩ 黄后岱《重建宗祠根茂堂叙》,《虬川黄氏宗谱》。

⑪ 俞元膺《虬川黄氏宗谱序》,《虬川黄氏宗谱》。

⑫ 黄永早《虬川黄氏重修宗谱序》;章钊《虬川黄氏宗谱序》;黄应济《虬川黄氏重刊世谱序》,《虬川黄氏宗谱》。

⑬ 黄师浩《虬川黄氏家谱源流序》,《虬川黄氏宗谱》。

略》、冯雪茹的《〈虬川黄氏宗谱〉与虬川黄氏家族研究》等论文^①。这些研究详细梳理了虬村黄姓刻工刻书的种类、数量和刻工的家族世系等问题,但涉及族谱编纂及谱序源流等问题的研究比较少。本文着重从《虬川黄氏宗谱》出发,探讨黄氏族谱编修中宗族谱系构建等相关问题。

二、《虬川黄氏宗谱》谱系的构建及来源

宗族谱系的构建是族谱编纂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这些上溯至远古时期的谱系虽然可信度不高,但其对祖先和世系的追溯关系到本族的出身、社会地位、正统性及与同姓大族之间的联系等一系列问题,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在明清时期徽州各族纂修的族谱中,将家族祖先世系上溯到三皇五帝传说时代人物的现象非常普遍^②,大部分家谱世系皆从黄帝开始,一直延续至秦汉乃至唐宋时期的某同姓重要人物,如汪华、程元谭、黄香分别都是徽州地区同一姓氏共同认可的祖先。对于这些追溯,黄宗羲评价道:“氏族之谱,无论高门悬簿,各有遗书,大抵子孙粗读书者为之,掇拾讹传,不知考究,抵牾正史,徒诿嗤笑。”^③诚如黄宗羲所言,这些追溯本身并无多少可靠性,他们表述的也可能“仅仅是中华民族绝大多数人的一种历史文化认同观念”^④,但不同家族通过追溯建立起来的不同世系,却代表着族谱撰修者通过支系选择表现出来的宗族认同,其实质是为本宗族在现实世界中的地位服务,这才赋予了这些扑朔迷离的历史追溯以实际意义。对于族谱编修中祖先谱系的构造问题,学界已有关关注,并多将研究重点放在总体论述和大族望族家谱之上,对普通家族的研究不是很多^⑤。那么,虬村黄氏是怎样追溯祖先源流,构建宗族世系的呢?又是怎样通过构建族谱,为自己的宗族支派寻找稳固的靠山,以提高宗族地位的呢?我们可以通过《虬川黄氏宗谱》对宗族世系和祖先人物小传的构建管窥一二。

(一) 早期宗族世系

《虬川黄氏宗谱》对早期宗族世系的构建主要有两部分,首先是康熙年间黄师浩所撰《虬川黄氏家谱源流序》,简要记载从上古颛顼到明代洪武年间黄许寿之间的世系;其次,从东汉黄香到南宋年间黄三的世系及人物生卒年月、事迹等都详细写于世系之中。

黄师浩《虬川黄氏家谱源流序》中,列出了黄氏从颛顼到明洪武年间黄许寿之间的部分世系。具体如下:

颛顼—称—卷章—吴回—陆终—樊(夏)—梁泽(周)—缙—黄歇(春申君)—穗—东明(秦)—夷阏—初隆—桂龄—季琬—叔瑱—霸(西汉)—智—仲项—愷—植美—香(东汉)—琼—起(西晋)—积—寻—原奕—碧璇(隋)—德—章^⑥(唐)—芮—文炳—之才—三—原泰^⑦(明)—元山—许寿^⑧

黄氏族谱中所载的远代世系,尤其是黄三以上的世系非常详细,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在道光修谱之

① 周芜《徽派版画史论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9~47页;翟屯建《虬村黄氏刻工考述》,《江淮论坛》1996年第1期;刘尚恒《〈虬川黄氏宗谱〉与虬村黄姓刻工》,《江淮论坛》1999年第5期;曹之《明代新安黄氏刻书考略》,《出版科学》2002年第4期;冯雪茹《〈虬川黄氏宗谱〉与虬川黄氏家族研究》,天津师范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

② 卞利《宋明以来徽州血缘身份认同的建构与强化》,《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③ 黄宗羲著、陈乃乾编《黄梨洲文集》“序类”《淮安戴氏家谱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25页。

④ 赵华富《中国谱牒:始迁之祖、文化认同与民族史料——对胡适〈曹氏显承堂族谱序〉中几个问题的看法》,《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⑤ 目前学界对谱系构造问题的研究主要有:刘志伟《祖先谱系的重构及其意义——珠江三角洲一个宗族的个案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刘志伟《明清族谱中的远代世系》,《学术研究》2012年第1期;黄国信、温春来《新安程氏统宗谱重构祖先谱系现象考》,《史学月刊》2006年第7期;赵华富《中国谱牒:始迁之祖、文化认同与民族史料——对胡适〈曹氏显承堂族谱序〉中几个问题的看法》,《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冯剑辉《二程家族与徽州关系考》,《史学月刊》2011年第3期;林济《徽州祖先谱系的构造与祖、宗、族观念》,《安徽史学》2011年第3期;徐彬、祝屹《历史与文化认同:明清徽州家谱中的中原认同现象考察》,《池州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卞利《宋明以来徽州血缘身份认同的建构与强化》,《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⑥ 《虬川黄氏家谱源流序》中作“黄章”,世系图中作“黄璋”。

⑦ 《虬川黄氏家谱源流序》中作“原泰”,世系图中作“阳泰”。

⑧ 黄师浩《虬川黄氏家谱源流序》,《虬川黄氏宗谱》。

前,虬川黄氏家族中也没有完整的族谱流传下来,可能仅有一些前人收集的散佚残卷^①。那么,编者是从何处找到这些材料的呢?在其编写时,是否参考了其他黄氏家族的家谱?

黄氏是徽州的大族之一,支系繁多。明清时期许多黄氏支系开始纂修家谱,在道光年间《虬川黄氏宗谱》(以下简称“虬谱”)付梓前,徽州黄氏各支编修了各式各样的家谱,有统宗谱,如弘治年间休宁五城派修《新安黄氏会通谱》、嘉靖年间休宁古林等派修《新安黄氏左田正宗谱》;有各支派族谱,如崇祯年间休宁古林派修《古林黄氏重修族谱》、雍正年间歙县潭渡派修《潭渡孝里黄氏族谱》,等等。通过综合分析,我们发现虬谱所建立的早期宗族世系与弘治《新安黄氏会通谱》和雍正《潭渡孝里黄氏族谱》皆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歙县潭渡黄氏是徽州黄氏强宗大族的一支,由黄臣槐等主持编修的《潭渡孝里黄氏族谱》(以下简称“潭谱”)于雍正九年(1731)付梓,其宗族谱系以黄璋为始迁祖,其中一支历十六世到黄三始“住仇村”^②,虬谱的世系正与潭谱此支的世系一脉相承^③。并且,虬谱所载署名为黄师浩的《虬川黄氏家谱源流序》作于康熙己卯年(康熙三十八年,1699),而潭谱问世的时间为雍正九年(1731),晚于黄师浩之序,也在时间上就避免了虬谱故意攀附潭谱的可能。从世系表面来看,虬村黄氏是潭渡黄氏中黄三的后人,理应是潭渡黄氏的一支。但潭谱对黄三以后的记载却与虬谱相差甚远。在潭谱中黄三写“住仇村”后,有“绝”字,表明在潭渡黄氏修谱者的认知和观念中迁住虬村的黄三应是绝户,其下并无子嗣入谱,这就完全否认了虬村黄氏作为潭渡黄氏一支的可能。

结合上述黄师浩之谱序,就造成了虬谱与潭谱在记载上的矛盾之处。造成这一矛盾有两种可能,一种情况是,黄师浩之序确为康熙年间所作,但潭渡黄氏并不承认虬村黄氏确为自己宗族支系的一脉。另一种情况则是此署名为黄师浩的源流谱序并非康熙年间所作,实为道光年间修谱者的伪作,目的是与黄氏强宗潭渡派保持宗亲关系,附会其中。而第二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更大,因为除潭渡黄氏中的黄三在族谱中有明确记载迁往“仇村”外,其他徽州黄氏宗族各支系所修族谱中很少再有与虬村相关的记载,潭谱中迁往虬村的黄三是虬村黄氏在构建宗族世系时最重要的根据。虬村黄氏若想融入徽州黄氏之中,以潭谱作为构建宗族谱系的基础最为合适,且将谱序伪造成康熙年间所作也避免了附会雍正潭谱的嫌疑。所以,此署名为康熙间黄师浩作的源流谱序很可能是后人伪造的,虬谱的祖先世系也有攀附潭渡黄氏之嫌。

潭谱仅记黄香以下世系,对黄香以上远至上古时代的谱系并不详载,对此,虬村黄氏从《新安黄氏会通谱》(以下亦简称“会通谱”)中找到了解决之道。在会通谱中有《黄氏世谱序(出婺源横槎)》一篇,比较完整地叙述了黄氏从上古颛顼到唐代黄璋之父黄德的世系,黄师浩所作《虬川黄氏家谱源流序》与这篇《黄氏世谱序(出婺源横槎)》的内容基本一致。但《黄氏世谱序(出婺源横槎)》中从战国黄歇到东汉黄香的世系是断裂的,对此虬谱编纂者又从会通谱《浮梁勒功黄氏家谱序》中将前序缺失的从战国到东汉将近四百年的世系相继补充完整^④。

由此,在《虬川黄氏家谱源流序》中就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从上古时代的颛顼到明初黄许寿的宗族谱系,这一谱系并非修谱者凭空编造的妄言,实则是将《新安黄氏会通谱》与《潭渡孝里黄氏族谱》相结合

① 黄应济《虬川黄氏重刊世谱序》、黄开族《重修黄氏家谱叙引》中虽记载黄应济于万历年间所修族谱已付梓刊刻,但黄师浩所作《虬川黄氏家谱源流序》中又载“惜其(黄应济编修的族谱)未能成帙付梓”,前后矛盾。目前也并未发现虬川黄氏有道光之前成谱存世,所以《虬川黄氏宗谱》中关于道光以前修谱记录的可信度不高,很可能仅有一些散佚的残卷。

② 《潭渡孝里黄氏族谱》卷2《潭渡黄氏世系古图》,雍正九年(1731)刊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③ 虬谱和潭谱对黄璋以下到黄三的世系记载基本相同,虬谱的详细世系为“璋—亮—光—芮—文炳—后明—仁贵—阳泰—嘉福—柏岩—元昇—绩—之才—桀—宛—寄—三”,比潭谱多黄阳泰一人。对此,虬谱解释到“按阳泰公详永早公谱及应济公刻谱,载公为第四世。以后修诸谱俱脱去阳泰公,遂以嘉福公为第四世。按,仁贵公生时至嘉福公生时,稽查历代甲子六十有八年矣,一世之间相距六十余年,其中疑有阙逸。又详以后诸谱,改嘉福公早十数年生于光化戊午,似属可信,然旧谱及应济公谱岂反不足征信乎?至乾隆丁酉年,重造宗祠,又误公主未进,故世系与贞寿堂祀谱不符。今道光庚寅年重修宗谱,议从应济公谱补正,并迎公主入祠,以示异日后者知之。后裔开族谨识”(《虬川黄氏宗谱·源流世系》)黄开族以阳泰上下两代生年相差过大为依据,将阳泰加于仁贵和嘉福之间。此举表面上是对旧谱缺失阳泰的解释,实际上也是对潭谱世系缺阳泰一人的解释。

④ 详细内容参见黄云苏《新安黄氏会通谱》,弘治十四年(1501)刻本,首都图书馆藏。

的产物。序中构建的早期宗族谱系遵从了会通谱、潭渡谱的体系,将虬村黄氏的祖先、世系与潭渡派建立了相应的承袭关系。虬谱中《虬川黄氏家谱源流序》很有可能并非康熙年间黄师浩之作,而是道光年间修谱者的伪作。

(二) 人物传记

在宗族祖先世系的框架构建完成后,《虬川黄氏宗谱》又为一些重要的祖先增添传记、补充血肉。这些传记一部分附于世系图的小传之中,一部分单列出来,成为家族重要人物的传记。

虬谱的世系图不仅记载各世族人,还将每位族人的字号、生卒年月、生平、葬地、婚姻(包括妻子的生卒年月、葬地)、子嗣等情况都详细地开列于后,其中以生卒年月为主。如二十四世黄仕珍:

仕珍公,字廷聘,号东渠。安分守义,以善著于闾里。早失怙,卓然自立。生于成化戊子六月二十三日寅时,歿于嘉靖丙戌八月二十八日申时。娶张氏,生于成化乙酉九月初二日子时,歿于嘉靖甲辰六月十七日未时。同葬麻榨山乙向。子二,曰錠,曰铕。

再如二十六世黄应卷:

应卷公,字汝训,号习斋。生于嘉靖丁亥九月二十一日寅时,歿于万历甲申正月初六日,葬富埭。娶程氏,生于嘉靖辛卯八月二十三日寅时,歿于万历丁未十一月十八日亥时,葬社屋后。子六,曰一栋、一梓、一柱、一格、一校、一桂。

如黄仕珍一般,对其生平有只言片语记载的在谱中仅是少数,更多的是类似黄应卷这样的记载,仅有生卒年月,并无半点生平事迹。但从一世祖黄香开始到二十一世祖黄璋等祖先人物小传的内容却颇为丰富。如世系谱黄香后有小传:

香公,叶令况公之子,字文疆,世居江夏安陆,生于东汉永平辛未。事父母至孝,寒则温衾,暑则扇枕。年九岁母卒,思慕憔悴,殆不免丧,京师号曰孝行,有天下无双之誉。年十二,博学能文,太守刘公闻而召之门下孝子。于汉和帝诏诣东观,读所未见之书,又诏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书令。永元十二年别清河奏妖言之事,全活甚众。迁魏郡太守,赈济饥寒,敕居江夏孝行里忠孝之门。配李氏,封孝德宜人,同葬安陆源口。子二,曰琮、曰瑶。^①

小传中不仅记载了黄香的生卒年月、婚丧子嗣情况,也用百余字将黄香的事迹、官职记录于此,与后世子孙的记载相比要详尽得多。其实,这些小传的来源与远代世系谱相似,并非纂修者自己编写的,其中的大部分内容都可以从其他支派的黄氏族谱中找到踪迹。

虬村黄氏编谱者将自己视为潭渡黄氏的一支,虬谱中黄璋以后的祖先世系也多遵从潭谱,而通过对比我们发现,这些人物小传的内容却与潭谱这些祖先的小传大不相同。如一世祖黄香,潭谱传文曰:

香公,字文强,江夏安陆人,叶令况之子,事亲有天下无双之誉。九岁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丧,乡人称为至孝。年十二,太守刘护召署门下孝子,后除郎中,擢尚书郎。永元四年拜左丞,六年迁尚书令,后以为东郡太守上疏控辞,复留为尚书令,增秩二千石,赐钱三十万。延光元年,迁魏郡太守,坐水潦事免,数月卒于家。余详文献录《汉魏郡太守文疆府君传》,夫人李氏同葬安陆源口。(墓在今附郭安陆县城南五十五里,本府云梦县城北十五里黄公墩。又衣冠墓在江南苏州府昭文县东四十里梅里。又有双孝祠在湖广武昌府江夏县学明伦堂,右与孟恭武公同祀。见裔孙迪孺所刊双孝祠祀产杂录。臣槐补注。)子琮。^②

可以看出,虬谱和潭谱的黄香传虽有相似之处,但内容仍存在很大差异,虬谱传记应该不是直接来源于潭谱,而是另有出处。查阅《新安黄氏会通谱》,其中亦有黄香的小传,摘抄如下:

一世,香公,字文疆,江夏安陆人。事父母至孝,暑则扇枕,寒则温衾。年九岁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丧。年二十,郡守刘公闻而召之,署门下孝子。汉肃宗诏诣东观,读所未见书,又诏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书令。永元十二年,别东平清河奏妖言事,全活甚众,迁魏郡太守,赈济饥寒,敕居江夏

① 《虬川黄氏宗谱·源流世系》。

② 《潭渡孝里黄氏族谱》卷2《江夏始祖世系宗谱》。

孝行里忠孝门。详见《东汉书》及本朝御制《孝顺事实》《为善阴鹭书》。娶李氏,同葬安陆源口。^①

对比三部族谱中黄香的小传,可以看出,虬谱中黄香传的内容除比会通谱多了出生年份的记载外,其余几乎完全相同,同时也参照并适当加入了潭谱中的少量内容。

除黄香传之外,其余有事迹记载的早期祖先的传记,如二世琼公、四世琬公、九世积公、十世寻公、十一世原奕公的小传皆与黄香传类似,基本都是在会通谱小传的基础上增删损益而成,并非出自潭谱。

除世系图中的小传外,虬谱中还有《汉孝子尚书令江夏始祖香公传》《晋新安太守积公始祖墓碑志》《晋乡教授守贞先生寻公传》三篇单独的祖先传记。会通谱中三篇传记皆有,潭谱中仅存《汉孝子尚书令江夏始祖香公传》和《晋乡教授守贞先生寻公传》两篇。

对比三部族谱都载有的黄香传和黄寻传,我们可以发现,会通谱中的黄香传虽源于《后汉书·黄香传》^②,但做了一定的删减,仅保留了部分内容;潭谱和虬谱中的黄香传极为相似,皆是《后汉书·黄香传》的原文转录。

三部族谱中黄寻的传记内容基本相同,并且皆署晋陶瞻作,但此传与《后汉书·廖扶传》极为相似。《后汉书·廖扶传》:

廖扶字文起,汝南平舆人也。习《韩诗》《欧阳尚书》,教授常数百人。父为北地太守,永初中,坐羌没郡下狱死。扶感父以法丧身,憚为吏。及服终而叹曰“老子有言‘名与身孰亲?’吾岂为名乎!”遂绝志世外。专精经典,尤明天文、讖纬,风角、推步之术。州郡公府辟召皆不应。就问灾异,亦无所对。

扶逆知岁荒,乃聚谷数千斛,悉用给宗族姻亲,又殮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冢侧,未曾入城市。太守谒焕,先为诸生,从扶学,后临郡,未到,先遣吏修门人之礼,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当时人因号为北郭先生。年八十,终于家。^③

虬谱《晋乡教授守贞先生寻公传》:

先生名寻,字仲绎,一字子存,江夏安陆人,新安太守积公之子。习《韩诗》《欧阳尚书》,屡荐先生不起,教授于乡,从者数百人。父以仁政莅民,卒于官,葬郡南之姚家墩。先生禄守父墓,遂家新安。叹曰“老子有言曰‘名与身孰亲?’吾岂为名乎!”遂绝志世外。专精经典,尤明天文、讖纬,风雨、推步之术。州郡公府辟召皆不应。召问灾异,亦无所对。尝预知岁荒,乃聚谷数千斛,悉用给邻里乡党,又敛疫死亡骸无收者。平居不入城市。郡守李英,先为诸生,从学,后守郡。先遣吏执弟子礼,更欲荐用,固不肯就。时人称为守贞先生。年六十八,卒于家。子二原奕、贞奕,原奕为陶侃从事,官至都尉。

赞曰“为教不倦,为学不已。庐父之墓,居歛之里。利禄尘轻,征辟不起。顾新安之有黄,实先生之伊始。”^④

除传主姓名的差异外,三谱中黄寻的传记与《后汉书·廖扶传》的内容几乎一模一样,黄寻传应该是《廖扶传》的改头换面之作。三部族谱在直接挪用的同时,对廖扶的某些事迹也做了小幅更改,主要有以下两处:第一,在岁荒之时,廖扶“聚谷数千斛,悉用给宗族姻亲”,而黄寻则“聚谷数千斛,悉用给邻里乡党”。廖扶仅救助与其有血缘关系的“宗族姻亲”,族谱中黄寻的品格显然比廖扶要更高一层——即使没有血缘关系的“邻里乡党”也得到了黄寻的救助。第二,太守(或郡守)的举荐。《后汉书·廖扶传》中,太守“欲擢扶子弟”,廖扶不肯;族谱中,郡守欲举荐的则是黄寻本人。族谱中皆记载黄寻子黄原奕“官至都尉”,若与《后汉书·廖扶传》相同,则前后矛盾,所以族谱在此处根据谱中黄寻后人为官的情况做了修改。其后,三部族谱又分别按照自身族谱中构建的世系对黄寻的子嗣情况做了相应的改动,潭谱和会通谱写作“子原奕,为陶侃从事,官至都尉”,虬谱则按照自己族谱中的世系,将黄寻二子原奕、贞

① 《新安黄氏会通谱》卷1《谱图一》。

② 范曄《后汉书》卷80上《黄香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2613~2615页。

③ 范曄《后汉书》卷82上《廖扶传》,第2719~2720页。

④ 潭谱、会通谱黄寻传与虬谱内容相差无几,除个别字词存在差异外,仅在黄寻子嗣的描述上不同,潭谱、会通谱作“子原奕,为陶侃从事,官至都尉”,在此不再转录。

奕都列入其中。

由此可见,虬谱中祖先的传记多有抄袭、伪造之处,可信成分较少,在改造之时也并非全盘照搬,而是极尽所能地美化先祖,也尽量与谱中的其他记载保持一致,减少自相抵牾之处。

虽然会通谱和潭谱都有黄寻的传记,但会通谱与《后汉书·廖扶传》更为相似,并无文章末尾“赞”的相关内容,潭谱则自行将“赞”也加入传记之中。从这一点来看,就黄寻传而言,比起会通谱来,虬谱应该与潭谱有更为直接的渊源关系。

由此可知,虽然三部族谱都有黄香和黄寻单独成篇的专传,虬谱的两篇专传均与潭谱有极大渊源关系,这两篇专传很有可能是虬谱编者直接抄录潭谱而来,未参考会通谱。而对于潭谱中未载的《晋新安太守积公始祖墓碑志》,潭谱编纂者曾做过考证与解释“旧谱引各派支谱所载都亭侯陶瞻撰《元集府君墓碑文》,吾族白山公已考确为改窜夏承碑而成此文,今夏碑隶书墨拓现存郑村郑氏,故陶作未便录刊。……庶免承讹袭舛之弊。”^①潭渡黄臣槐等人在编写族谱时已经考证出所谓陶瞻为黄积作的墓碑实际是伪造的,所以潭谱并未刊载。但虬谱并未采纳潭谱之说,仍将会通谱中《新安太守黄君积墓碑铭》直接搬入族谱之中^②。

综上两点,就早期宗族世系和人物传记的构建而言,虬村黄氏族谱所构建的谱系应该与《潭渡孝里黄氏族谱》有极大的渊源关系。除此之外,对于潭谱未载而虬谱编修者认为重要的内容,则遵照《新安黄氏会通谱》将缺失的部分补齐,如从颍项到黄香的世系、从黄香到黄璋等人的小传等;对于潭谱中与虬谱有矛盾的地方,则对潭谱加以适当的修改,以增加族谱的连贯性和可信度,如《晋乡教授守贞先生寻公传》中黄寻的子嗣情况。

虬谱不仅极力构建与潭谱乃至会通谱统一的宗族世系和人物传记,在谱中转引地方名族志时也根据自身的需求对原文做了修改。如谱中所列罗愿撰文一篇,应该摘自《新安志》中《义民·黄芮》一条。虬谱与《新安志》原文大部分内容皆相同,却将黄芮的定居地由《新安志》中的“黄屯”改为“黄潭”。虬谱中写道“今县西九里黄潭是其居处也。……(芮)与其族人聚徙潭此故名黄潭。”^③《新安志》原文则为“今县西九里黄屯是其居处也。……(芮)与其族人聚徙屯此故名黄屯。”^④与此相似,虬谱在摘录程尚宽的《新安名族志》时也有意将“黄屯”之名改为“黄潭”。《新安名族志》原文为“唐有讳章者,始迁黄屯。……五世曰仲三,避唐季之乱,由黄屯再迁于此。”^⑤虬谱为“唐有讳章者,始迁黄潭。……五世曰仲三,讳文炳,避唐季之乱,由黄潭再迁于此。”^⑥此举并非无意而为,实有其特殊含义。“黄屯”之“黄”并非大姓,在《新安名族志》中仅有一支,即“迁居溪北虬村”的黄氏。而“黄潭”之“黄”却是歙县黄姓的大族之一,即潭渡孝里黄氏,《新安名族志》中位列黄姓首位的即为歙县潭渡黄氏,其祖先为“唐中宗时讳璋者,居郡西九里黄潭”^⑦。为保持与潭渡黄氏祖先的一致性,虬谱在转录《新安志》和《新安名族志》时有意将“黄屯”改为“黄潭”。

由此可见,虬谱的编修者在编纂族谱时有着极为明确的目的,他们通过对远代宗族世系、祖先小传的构建,通过对《新安志》等地方文献的改造,完成了将家族“跻身名门”的任务。虬川黄氏之所以重视对宗族谱系的构建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明清时期,许多宗族在纂修族谱时都尽可能地将自己的祖先与历史上的名人望族联系起来。“这种望族心理,在徽州宗族谱牒虚构世系和攀附贵胄等现象中显得尤为突出。”^⑧不仅在徽州,“望族心理”在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沙湾何氏所修《沙湾何氏族谱(抄本)》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沙湾何氏将祖先

① 《潭渡孝里黄氏族谱·录刊隐南公谱凡例》。

② 会通谱和虬谱中所载的《新安太守黄君积墓碑铭》确如潭谱考证,实为伪作。详细可参考冯剑辉《徽州家谱宗族史叙事冲突研究》,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0~102页。

③ 罗愿《唐旌表孝子黄芮公传》,《虬川黄氏宗谱》。

④ 罗愿《新安志》卷8《黄芮》,《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720页。

⑤ 戴廷明、程尚宽等《新安名族志》,朱万曙等校点,第159页。

⑥ 程尚宽《新安黄氏名族志叙略》,《虬川黄氏宗谱》。

⑦ 戴廷明、程尚宽等《新安名族志》,朱万曙等校点,第152~153页。

⑧ 郑小春《谱牒纷争所见明清徽州小姓与望族的冲突》,《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追为黄帝,后为封于韩的周武王之子,此后也是世代仕宦。尽管沙湾何氏在明清时期已经成为珠江三角洲的著名大族,但仍然十分重视对宗族世系的追溯和构建。对于做此追溯的原因,《何氏留耕堂族谱序》写道“溯之有源,寻之有本,而能别夫尊卑长幼之序者,家之谱也。故人见夫一家之中,绵绵延延,枝叶繁茂,莫不仰慕之歌颂之。”由此可见,通过这种祖先追溯,可以增强宗族内部的荣誉感和认同感,亦可在外族面前提高自身的声望和地位^①。仕宦大族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普通家族虬川黄氏,他们在编纂族谱时也一定存在这一心理。

第二,为家族寻找本地同姓大族作为依靠。一般家谱中对祖先渊源的记载往往要与地区同姓大族的记载连接起来,也要与地方的大族志、名族志紧密联系起来。所以虬村黄氏竭力与潭渡黄氏及休宁五城黄氏等黄姓大族修纂的族谱都建立一种渊源顺承关系,并根据自己的需求对地方大族志、名族志的记载进行改编、调整,将自己的家族附会于这些地方大族之上,以期得到他们的承认、支持,甚至庇护。

三、结 语

虬川黄氏是明清出版印刷史上最为著名的刻工家族,其足迹遍及全国各地。黄氏刻书工艺精湛,得到汪道昆、程敏政等诸多名人的赞许,为中国古代刻书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如此,其刻工、技艺的身份却始终伴随黄氏左右,甚至在他人为其族人所作的传记中也不避讳。如乾隆年间进士、崇阳知县曹学诗为黄利中作传,称因其乃“曲艺中有此乐善不倦之人,故乐传之,以风世云”^②,认为黄利中是乐善好施之人,在曲艺人中属少有之辈,所以愿意为其作传,以劝勉世人向黄氏学习。另有《黄君敬斯老人传》亦认为黄后梓是以“技艺”隐于新安“万山之间者”^③。另外,虬川黄氏家族中并未出现一位富商大贾或显赫官员,且家族支系较少、人口不多,是徽州身份比较低微的平民家族。但就是这样的普通家族也极力集合家族的人力、物力,历经几代人的努力编修族谱。他们在编修族谱时通过对宗族远代世系和祖先小传的构建,与休宁五城黄氏和潭渡黄氏等强宗大族都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将自己也列入望族之后。

纂修家谱是一个家族凝聚力的体现,“能够修谱,是宗族有活力的表现,也是大族、望族的标识;族谱不能修,表明宗族缺乏凝聚力,缺少修谱的财力,落入小族的处境”^④。徽州是一个宗族观念极强的社会,宗族之间在权力分配和社会地位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竞争,要想在这样一个宗族社会中获得较好的生存环境,就必须合众人之力,加强宗族内部的联系,编修族谱即是强化宗族组织的表现之一。另外,纂修族谱的过程也是为家族寻找同姓大族作为依靠、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过程。

所以,族谱对经常旅外做工的虬川黄氏刻工家族来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外务工时同族可以相互关照,团结一致;在徽州内部村落生活时,也可以通过对宗族组织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同姓大族的认同,抵抗来自外姓的压力,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因此,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与困难,虬川黄氏宗族仍有极高的修谱意愿。

《虬川黄氏宗谱》作为明清时期徽州普通家族族谱的代表,为我们探讨普通家族的族谱编修情况及隐藏在族谱背后的社会意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值得我们重视。

(黄山学院冯剑辉教授为笔者提供了重要材料,谨此致谢)

责任编辑:张朝胜

① 关于沙湾何氏族谱的内容,参考刘志伟《祖先谱系的重构及其意义——珠江三角洲一个宗族的个案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

② 曹学诗《黄义先老人传》,《虬川黄氏宗谱》。

③ 汪崇议《黄君敬斯老人传》,《虬川黄氏宗谱》。

④ 冯尔康《宗族不断编修族谱的特点及其原因——以清朝人修谱为例》,《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